

人格：文化的积淀



MAN & CIVILIZATION 人与文化丛书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美] V. 巴尔诺 著 VICTOR BARNOUW

周晓虹 等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人格：文化的积淀

〔美〕V·巴尔诺 著

周晓虹 等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VICTOR BARNOUW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THE DORSEY PRESS•1973

本书根据美国道塞出版公司1973年版译出

人格：文化的积淀

Renge: Wenhua De Jidian

(美) V. 巴尔诺著

周晓虹 等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480,000 开本：850×1168 $\frac{1}{2}$ 印张：22 $\frac{1}{2}$

印数：1—1,0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任天舒

责任校对：高庆

封面设计：赵多良

李文杰

ISBN 7-205-00487-X/C·42

定价：8.90元

人与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编	陈志强	滕守尧	
副主编	王大路	丁 枫	
编 委	张本楠	刘烈恒	高凯征
	李兴武	李春林	梁刚建
	张植信	王 波	朱疆源
	赵子祥		

“人与文化丛书”出版前言

人类越是文明，越是要了解自己。

自文艺复兴之后，人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哲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化学、美学等学科都以其人与文化这类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深邃性而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学者，他们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调查研究，潜心思索，使这类学科的理论建设有了迅速的发展，名家济济，佳作叠出，而全世界的文明人也日益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认识到研究人与文化的重要价值，成为这类学科著作的最热情的读者。于是，这类学科的著作便成为世界范围的出书与读书的热点。

我国关于人类与文化的研究同发达国家相比起步较晚，真正地热起来也就是这几年的事。人们急需这方面的知识。这也是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必然的需要。

为满足广大读者需要，我们编辑了这套“人与文化丛书”。

谈到人，解答人类之谜，总离不开文化。美国已故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克莱德·克鲁克洪说：“文化是无所不在的。”这位美国人类学协会的前主席很善于用身边的例子证明他论断的雄辩。他曾说过：“打喷嚏乍看像是纯属生物学的现象，但其中却发展出一些小小的习俗，诸如说一句‘对不起’或‘多多保重’。不同文化的人们，或者同一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都不会以严格相同的方式打喷嚏。打喷嚏是在某

种文化网络里结成的生物行为。要指出哪一件活动不是文化的产物是很困难的。”这位美国教授的论证确是很机智，连打喷嚏这种生物性的行为都被限定在一定的文化网络中，人与文化联系的必然性不是相当清楚了么？没有超脱于文化网络的真正意义的人，也没有离开人的文化，尽管关于人与文化的观点众多，但在这一点上倒是众口皆碑。

就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把这套丛书叫做“人与文化丛书”。

顾名思义，这套丛书的内容在于研究人，研究文化，研究人与文化的关系。它坚持著译并举，中西合璧，以人为核心，以文化为主题，既追求历史探索的深度，又追求现实眼界的广度，更坚持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它还刻意求新，无论是译作还是著作，都需要站在这一学科研究的当代高度上，反映新成果，揭示新趋向。这套丛书在整体构想上并不囿于这一学科研究的哪一种观点或成果，因此即使有树立、争鸣观点的著作，只要合于上述要求，我们也积极地介绍给读者。

这套丛书的编委和译、著者们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他们具有立足点高，眼界开阔，较全面地掌握着世界科学知识新成果的特点。建设我国无愧于世界的人类学与文化学体系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到这一代中青年学者们的身上。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会有助于在我国形成一支人与文化研究的强而有力的理论队伍。

人——文化的奥秘，这一新的司芬克斯之谜，正期待着更多的解谜人。

“人与文化丛书”编委会

1988年元旦

中译本序言

从最早读波亚士的《原始人的心理》、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和《两性社会学》，到后来读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译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和《文化与承诺》，我就开始觉得，尽管每一学科的确立都少不了几部像上述一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奠基之作，但对于入门者来说，那种集有关学者的理论之大成而写出的内容丰富的通论性读本可能更具价值。出于这种信念，我于去年十月决定动手翻译美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家维克托·巴尔诺的《人格：文化的积淀》。这部40余万字的著作共分五编十八章，从概念、历史、方法、现代研究到具体应用，事无巨细、一应俱全。但这种看似一个学者接一个学者、一项研究接一项研究、一部著作接一部著作的“罗列”，并不乏内在的历史连续性，仔细读来，使你不能不觉得，这部著作对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从萌生、成长到繁荣的全部过程作了完整的动态描述。

一、从文化的描述到人格的分析：研究的性质

文化与人格研究，正如维克托·巴尔诺在导论中所说，是自本世纪20年代起，从人类学和心理学，或更恰当地说，

从文化人类学和人格心理学的接壤处展拓出的一个极有前途的新兴领域。

那么，能不能从这里出发，去理解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学科性质呢？

著名美籍华人学者许烺光先生将文化与人格研究称为“心理人类学”，另处有些学者将此称为“心理人种志”，凭借的大概都是这一理由。在他们看来，这是在心理学和人类学之间产生的一门具有双方特点的而又独立存在的边缘学科。

但依我看，说这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亚领域，或说是文化人类学家所作的社会心理学尝试似乎更接近事实。^①这样说的理由是，首先，文化与人格研究虽然横跨人类学和心理学两大学科，但纵观该研究的全部历史，涉足这一领域的主要是文化人类学家。诚然，文化人类学家对社会心理学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一书所唤起的（在该书出版的第二年，即1914年，马林诺夫斯基开始了可以称之为文化与人格研究之滥觞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之行），而弗洛伊德本人在1923年写成的《自我和伊底》中也确实企图从文化的角度描述“超我”的产生，但他对人格的分析毕竟是个体的和心理的，而不是社会的和文化的。在此之后，以沙利文、霍妮等人为代表的精神分析的文化学派，虽然力图探求文化因素是如何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决定着人格及人的行为，但由于他们热衷于抽象的文化

^① 参见拙作：“论文化人类学对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贡献”，《社会学研究》，1987年5期，61—72页。

和病态的人格，所以“对社会科学并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卡丁纳语）当然，事情也有例外，这一派的埃里克·弗罗姆和人类学家M·麦克比对墨西哥一个村庄的社会性格的分析，确实是一项成功的文化与人格研究。但总的说来，文化与人格研究毕竟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亚领域。

其次，从事文化与人格研究的人类学家又与以往那些只“侧重于文化特质分析”的人类学家（如泰勒、弗雷泽等人）不同，他们所注重的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因素对该社会成员的人格发展的影响。无论是马林诺夫斯基对生活于母系社会之中的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的研究，或是本尼迪克特对具有日神精神的祖尼人和具有酒神精神的克瓦基特人的描述，再或M·米德对萨摩亚人的青春期现象和新几内亚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关系的探查，以及杜波依丝对阿罗人所作的分析，无一例外，都是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人格以及受人格影响的人的行为所作的阐释。这种阐释从本质上说，是社会心理学的。在为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一书作序时，波亚士这位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倡导者、人类学历史学派的巨擘就曾坦率地写道：“试图把握一种文化总体的意义的渴望迫使我们考虑如何描述标准化的行为……，对这些社会心理问题发生兴趣并不与历史的研究方法相冲突。相反，社会心理的研究方法揭示了文化变革中活跃的动态过程……。”^①从本书第二编“开拓性研究”的论述中可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是整个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大

^① 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页。

本营，除马林诺夫斯基以外，辟以专章论述的本尼迪克特、米德、林顿、卡丁纳和杜波依丝，以及虽未辟专章论述但显然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波亚士、萨丕尔，无一不来自于此。了解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的性质，无疑有助于了解文化与人格研究的性质，而这种了解最简便的方式大概是援引奥托·克林伯格的一段评语，这位波亚士的弟子、30年代哥大人类学系的同仁曾十分自豪地写道：“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心理学系，在整个世界上，这种类型的社会心理学系也是第一个。”^①

二、从文化主位研究到文化客位研究：历史的线索

维克托·巴尔诺在第二编中以四章的篇幅探讨了马林诺夫斯基和哥伦比亚大学几位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所作的“开拓性研究”之后，随即转入了第三编“现代研究”的论述。虽然作者没有专门交待区分开拓性研究和现代研究的依据，但读罢全书，可以找到这样几条理由：一，年代的先后。马林诺夫斯基、波亚士师徒，以及林顿等人的研究，大多在50年代以前；而乔治·P·默多克和约翰·W·M·怀廷等人所倡导的跨文化调查（由此建立了著名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以及规模宏大的六文化研究规划则主要发生在50—60年代之间。二，研究中心的转移。如果说50年代以前，文化与人

^① 奥托·克林伯格：“社会心理学在一所大学中的地位”，载《社会心理学展望》，1966年纽约，1页。

格研究的中心在哥伦比亚大学，那么，在此之后，这一大本营则移往耶鲁大学。三，研究视角的变化，即从文化主位研究转向文化客位研究。我觉得，最后这点是开拓性研究和现代研究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所在；而这一转变，也是了解整个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

利用文化主位研究方法的文化人类学家（如马林诺夫斯基和波亚士等开拓者），都力图对某一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希望能够因此而“洞悉土著民族的内心世界”

（马林诺夫斯基），从被研究者的角度，借助他们的眼光去理解整个大千世界。在这里，研究者力求借助于其所研究文化的独特视角，去解释人格和人的行为，作为研究客体的文化由于研究者的结合或参与，本身又成了理解世界的主体。但文化客位研究则与此不同，正如巴尔诺在书中所引的马文·哈里斯的定义所说的那样，这样研究方法只需要科学的观察家对社区的差异现象作出适当的判断。在这里，研究者始终置身于其所研究的文化之外，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始终处在观察的客位上。

文化与人格的开拓性研究，所以基本上采取了文化主位研究的方法，这是由研究者们所奉行的文化相对主义所决定的，而这种观点本身又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社会思潮的反映，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理论来源。20世纪初期，整个世界局势动荡不宁，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并终于导致了一次世界大战及随后而至的十月革命。战争和革命的双重影响以及在此前后出现的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代表的近代物理学上的一系列突破，首先在当时的西方史学研究中

反映了出来。“欧洲中心论”连同历史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信仰，这些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所信奉并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观念摇摇欲倾。1918年，德国史学家斯本宾格出版了那本名噪遐迩的历史巨著《西方的没落》，明确宣称任何思想家都只能在他所生活的条件下进行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不存在什么普遍永恒的东西。

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动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相对主义观点，不能不对文化人类学，这个直接接触外族文化的学科产生深刻的影响。不可否认，文化人类学最初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殖民活动发展起来的。而在殖民者和传教士对他文化的描述上建立的最初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种族中心主义”的偏见（这是和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论”相一致的）。但在整个西方所呈现的没落趋势之前，无论是人类学的演化学派（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演化的最先进体现），还是传播学派（各族文化都由西方文化传播而来），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在这种情况下，马林诺夫斯基、波亚士及众多的后来者开始不仅承认文化的多样性，而且进一步承认这形形色色文化的合理性。而求得这种合理性的标尺，就是文化相对主义，即“根据文化现象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场合中的意义来评介其本身。”^①正是这一观点使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开拓者们相应采取了“文化主位研究”的方法，并促使他们对诞生于本世纪初的社会心理学，即那种“……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人的心理学”（墨

^① 见《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3—4合卷，戴维·比德尼撰写的“文化相对论”词条。

菲语)，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他们明确宣称，“人类学家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的行为，而不单单是某种传统（如我们西方的传统）所塑造的行为…”。①

尽管这样一种文化观带有明显的否认文化的绝对标准和绝对功能的相对主义倾向，并从中衍生出了全然否认一切文化价值评判的“一双靴子和一部莎士比亚全集等量齐观”的后现代主义观点，但几十年来，在反对种族主义和维护非西方民族文化的斗争中，它却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今天，你去读波亚士、本尼迪克特和米德的著作，会为他们那原始文化的客观公正的描述以及对原始民族所怀的手足之情而感动；但你可能不知道，这些在有着浓厚的民族优越感的西方文化的熏染下长大的学者，在进行这些研究时，内心里与自己原有的文化观进行过怎样激烈的斗争。如果你有机会读到波亚士早年的现场笔记，或米德的自传《黑莓的冬天》

（这些是巴尔诺在这部著作中未曾提及的），心里哪怕有一点“民族自大狂”的意识，也会为这些西方学者对本民族所具有的文化批判精神而感到害臊的。

本世纪50年代以后，文化相对主义成了整个文化分析的最基本的原则，人们不必因为担心自己的研究具有“种族中心主义”的倾向而去认同其所研究的文化，为了避免对所研究文化的“迁就”而形成的另一种片面，学者们开始寻求更为客观的研究方法，这大概是导致文化主位研究向文化客位研究转变的契机。

① 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页。

事实上，文化主位研究和文化客位研究之间并不是没有联系的。运用“人类关系区域档案”进行文化客位研究的学者所遵循的原则和方法，许多都可以从开拓性研究中找到其雏形。比如，巴尔诺在第八章“跨文化调查”中曾谈及“人类心理一体”原则，并且引了耶胡迪·A·科恩的话说，这是构成现代跨文化研究的基础的两个主要原则之一。诚然，正是因为人类具有许多共同的心理单元，才有进行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之可能，但巴尔诺不曾注意到，最早明确提出“人类心理一体”原则的是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的科拉·杜波依丝。

除此以外，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跨文化调查中所举的若干例子，比如比阿特丽丝·B·怀廷关于巫术和社会控制的研究、D·霍顿关于酒精在原始社会中的功能的调查、约翰·怀廷关于儿童教养和人格关系的研究，以及理查德·克拉克洪等人关于成年仪式功能的研究，无一例外，皆属于“问题取向”的研究，即针对某一具体问题开展的现场研究，而这种方法正是由米德最先引入的。好在巴尔诺在本书第六章中，以整整一章的篇幅对米德三项著名的“问题取向”的研究（青春期、性别角色、儿童教育）进行了充分的论述，证实这点并不是太困难的。

三、从基本人格的界定到国民性研究：连续的主题

既然文化与人格研究关心的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因素对该社会成员的人格发展的影响，那么，它必然要回答这样一个

问题：即，生活于同一文化中的不同的个体是否具有相同的人格特征及行为模式。

纵观整个文化与人格研究，这一问题确实成了许多文化人类学家怀着经久不衰的兴趣殚思竭虑的主题。维克托·巴尔诺在《人格：文化的积淀》中也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论述这一主题。第二章“社会性格的概念”、第四章“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第六章“林顿、卡丁纳和杜波依丝学派”、第十章“国民性研究”，以及第十七章“文化、人格和社会变迁”，在这部总共十八章的著作中，巴尔诺用了四分之一以上的章节，介绍了林顿的“基本人格类型”、卡丁纳的“基本人格结构”、杜波依丝的“众数人格”、弗罗姆的“社会性格”、本尼迪克特的“酒神型”和“日神型”文化精神，本尼迪克特、米德、杰弗里·戈若和许烺光的“国民性”研究，以及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对变动中的美国人性格的分析。尽管学者们各自使用的概念不同，但他们所论述的问题的性质是相同的，即都是为了说明那种在既定社会中由共同的文化所决定的人们之间基本相似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模式；或者干脆说，都是为了解决所谓“国民性”（又称民族性格）问题。而从“基本人格类型”到“国民性”，这一研究主题的名称变化，正如后文所要提到的那样，本身不过是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时代要求的反映。

这样说来，文化人类学家的国民性研究的历史，似乎比巴尔诺所引的杰弗里·戈若的划定还要早，在1934年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出版以前，1927年就出版过英国剑桥大的心理学家和人种学家W·H·R·里弗斯所写的《文化冲

突和种族接触》。在这部生前未能出版的著作中，作者把澳洲土著描绘成“内向的”，而把非洲土著描述成“外向的”。没有资料说明，是否是里弗斯的这本著作拨旺了直到40多岁还基本上一事无成的本尼迪克特的生命之火，但从后者在《文化模式》一书中将祖尼文化描述成“太阳神型文化”，而将克瓦基特文化描述成“酒神型文化”的做法来看，确实和前者有着几分相似。

如果说本尼迪克特写作《文化模式》的目的，和其师波亚士、其师妹米德此间所作的研究一样，主要在于说明文化对人格的决定作用，那么，当这些研究已经“成功地说明了人格在极大的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之后，作为后继者，林顿等人自然会进一步企图找出具体社会中由其文化所决定的占主导地位的、具有典型性的人格。如果不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即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绝大多数从事文化与人格研究的人类学家可能还会继续认真地从事这种“本职工作”。

正是规模空前的二次世界大战，促使文化人类学家对民族差异的自觉思考从那些弱小、落后的原始社会，投向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命运的那样现代民族和文明社会。战争须要了解日本人、德国人、苏联人、罗马尼亚人、泰国人，也须要对自己的民族进行文化上的反省，它给了从事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学者们为自己的祖国——美国服务的机会。可以说，既是战争促成了从基本人格的界定向国民性研究的转变，也同样是战争使国民性研究在四、五十年代呈现出了令人怀念的繁荣景象。

巴尔诺在《人格：文化的积淀》一书中已经对国民性研究作了充分的论述，所以，我们不妨去谈几句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军刀》，这本享誉学界的经典之作的成书过程，对于了解整个国民性研究的历史是不无启发的。

1944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已开始明朗，美国政府便开始着手考虑如何结束战争及制订战后对德、日等国的政策。由于日本这个东方民族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常常令英、美等西方国家迷惑不解，本尼迪克特便受其所供职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之托，研究日本，借用其本人的话，即利用“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一切技巧来说明日本人是怎样一个民族”。当时美国政府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是：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就使其投降？如果日本投降了，是否须要打碎其原有的行政机构而由盟军实行直接的统治？虽然由于战争，本尼迪克特不能发挥文化人类学家的特长进行现场研究，但通过访问日本移民，阅读、观看、分析日本的书籍、杂志、电影，研究日本的历史，她成功地完成了这项文化遥距研究，其结论是：美国不能像对待德国那样直接统治日本。她的预测和后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一致的。

1946年，本尼迪克特将这份报告整理、补充正式出版，并题名为《菊花与军刀》。正如书名所示，作者通过菊花和军刀的对比，成功地揭示了日本这个既尚武又爱美的民族的双重性格。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的长处就在于能够全心全意地朝着某一目标前进，但如果发现“这已以失败告终”时，便能够调过头来朝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日本人有一种允许选择的伦理。他们希望能够在战争中取胜，但他们失